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一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七八期（zk1906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动荡岁月】	文革历史概说	印红标
【档案探秘】	一份关于清华造反派记录在案的资料	孙怒涛
【往事非烟】	“文革”一夜抬尸经历	林一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动荡岁月】

文革历史概说

• 印红标 •

文化大革命过去四五十年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和沉痛教训的历史长期被遮掩，致使很多中青年对其知之甚少，概念模糊，不利记取前车之鉴。因此，普及基本历史知识十分必要。

以下概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三个问题并作一些分析，以求促进思考：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一斗二批三改”；

第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一、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

（一）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

一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三年时间，这是文革的“三年说”。强调干群矛盾、社会矛盾的人比较偏爱三年说，因为过了这三年，就没有群众大规模冲击领导的运动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进行了大约十年。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通常采用的观念，目前也被国外研究者普遍采用。这是文革的“十年说”。

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通常以中共的重要会议或决策作为标志，将这十年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也是主体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造反运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巩固新秩序，落实改革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林彪事件。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这个阶段，最高领袖面临困局，执意维护他的文化大革命实践和理论。

“十年说”还有一种简化的两段分期方法：主体阶段与后续阶段。主体阶段即三段分法的第一阶段，后续阶段合并三段分法的中期和后期。以下讲述采用这种两段的分期方法。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是主体阶段。在这个阶段有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充分表现，有大规模的群众造反运动；文革提出的主要任务在三年中基本完成。其中改革的任务还延迟到后面的一段时间。后七年是运动在扫尾阶段节外生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三年引起的矛盾和争议欲罢不能，难以收场，直到坚持文革的领袖逝世，文革才最终划上句号。

（二）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阶段（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其最独特之处只有在前三年才有充分的表现，而后续阶段的运动态势与前三年有明显的不同，而与文革之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大体相似。

文革的主要目标在前三年基本实现：领袖率领群众运动打垮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教育文艺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尽管最后一项改革的任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予以深化。

在前三年，出现了领袖大规模发动和领导的群众造反运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谓“造反”就是以下犯上，群众批判斗争领导，学生批判斗争老师等等，尽管是领袖发动的奉旨造反，但是仍然有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相当充分的表现。在后续阶段，群众造反活动则成为罕见的个案。

在前三年，大体实现了毛泽东谋划的从大治到大乱，再从大乱到大治的周期。具体地说，就是从放手发动群众参与运动，冲击和瘫痪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到结束群众运动，重建党政领导体系。从主要整肃党内当权派到主要清理群众，包括不同程度参与和没有参与造反运动的群众。尽管初步建立的新秩序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领袖设想的三年文革，到1969年大体告一阶段。此后，领袖和中央没有明确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没有明确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否结束，是一个模糊的问题。这时，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这样逐渐过去了，结束了。当时国际上也普遍持这样一种看法。

（三）文革主体阶段的历史脉络

文革主体阶段经过了发动、高潮、收场三个阶段。

1，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1966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967年1月夺权）

文革的发动是从治到乱，即从文革前的常态转变到文革式非常态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次发动从1966年5月到7月下旬。这段时间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而毛泽东在外地操控全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发出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和指导的“通知”（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炮轰校领导的大字报，点燃学校运动之火，随后各地学生起而效仿。为应对局面，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及地方（或部门）党委派出工作组到一批大学和中学领导运动。这一时期，运动主要在教育和文化界进行。大中小学先后停课，相当多学校的原领导瘫痪了，文化单位也开展了运动，但是工厂农村仅仅进行政治学习，保持正常生产秩序。

在这段时间，学校和文化单位的运动在党委或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原党委有的进行了改组，有的由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或工作队）替代其领导职责，例如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是在下级党组织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通常采取的作法。

在这段时间，斗争的矛头主要对着高中级知识分子，就是所谓“学术权威”和有一定地位的教师、教授、文学家、作家等，以及文化教育界的党政领导人，如当时被称为“黑帮”的校长、党委书记等。

在运动中，一些激进学生不服从工作组的领导，或者挑战工作组的权威。工作组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批评或打压这些学生。这个阶段前后大约50天，后来被称作“50天”，运动的态势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63—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相似。与反右派斗争相似的是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外，主要指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似之处是运动主要在基层展开，除了北京市之外，各地运动没有指向省领导；除了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之外，没有指向部委领导，更没有指向中央领导。

（2）第二次发动从1966年7月下旬到9月底。这个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一线领导运动。同时，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对前一段也就是“50天”的运动非常不满意，从南方回到北京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说工作组的方针是镇压群众，批评主持中央并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后来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他从1965年就想把刘少奇搞下去。既然已经要把刘少奇搞下去，为什么还要刘少奇在中央主持领导运动？人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是欲擒故纵，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出了问题，就可以兴师问罪，名正言顺地搞掉刘少奇。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刘少奇受到批评，工作组随之被撤出学校。不久之后，中央提出在运动中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反对上级包办代替。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8日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简称“十六条”），并向社会公布。这是文革的第二个纲领性的文件。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文件，其内容偏重思想文化界的批判。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加了一些话，例如：赫鲁晓夫那样人就睡在我们身边等，但是原文还是从文化

界批评论起。五一六通知没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

此外，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在6月至7月与学校工作组发生了摩擦，尽管工作组把他们当作左派，他们仍然不满足于工作组的领导方针，提出了一些更激进的要求，工作组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不予赞同。红卫兵针对工作组贴出了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并坚持不解散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在通常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允许群众自发地成立群众组织。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之后，尽管他们的主体是干部子女，来自红色家庭，但是他们自行成立组织，是工作组不能长期容忍的。刘少奇、邓小平对此有明确的指示：这些左派学生组织（指红卫兵这类组织）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不好，不利巩固党的领导。邓小平指示共青团中央（清华附中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要“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就是要用共青团的组织消解红卫兵，吸收红卫兵头头进入学校共青团团委，同时要求红卫兵自行解散。但是这些红卫兵坚持不解散。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显然是看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矛盾，工作组执行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支持红卫兵意在鼓励学生追责刘少奇，但是这些红卫兵当初没有领会领袖的这个用心。此外，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还表明，他要打破党组织对群众组织直接管理的惯例，突破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掌控，对自发的左派学生组织解禁，使其成为参与运动的新形式。

毛泽东在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全会文件形式发出。这篇短文尽管没有点刘少奇的名字，但是讲到几件涉及刘少奇的事情，熟知党内斗争的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刘少奇。这个名为大字报的短文，暂时没有向群众公开。但很快便流传到社会上。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失去了党的第二位领导人的地位，由林彪接替。8月18日，毛泽东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报纸和广播电台报道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次公开了中央人事变动，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退居第7位。另一个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官方媒体第一次对红卫兵做赞赏性的报道后，各地学生纷纷效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从8月初起至12月底，中共中央支持了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允许红卫兵免费乘火车，各地安排串连学生的食宿，来京学生免食宿与公交费。毛泽东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各地到北京的红卫兵，被检阅的红卫兵总数达1200万。毛泽东以此种方式，进一步发动群众，把全国的运动联成一片。

8月20日，北京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这个运动中，红卫兵从强制改变风俗文化发展到越来越疯狂的暴力行动：抄家、打人、驱逐所谓“牛鬼蛇神”离开大城市，造成了对文化、以及人民生命和公私财产的骇人听闻的破坏，在北京和很多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红色恐怖”，史称“红八月”。这一阶段冲锋陷阵的红卫兵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早期中学红卫兵，人们称其为“老红卫兵”。

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的基层，指向所谓“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本家及其他已经被打倒的人），客观上冲淡了毛泽东所要求的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方向。有的红卫兵甚至阻扰冲击领导干部，发传单声言：“只许左

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反对冲击领导干部。如果任其发展，冲击党内走资派的重点目标势必落空。因此，在9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学生座谈会。在10月初，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3）第三次发动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旗帜。这个运动的起点是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上的讲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林彪这个讲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精神。

《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斟酌文字，延期到10月3日出版。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不再领导部队院校的运动。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这个紧急指示，并告知这个紧急指示适用于地方大中学校。

这一阶段发生的重要事件还有10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主旨讲话，进一步阐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意义。他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为文革之初，刘少奇领导运动时期以及老红卫兵或文革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和群众平反。要注意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要求的是为学生和群众平反，不包括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一个内容是批判“血统论”，就是批判早期红卫兵即“老红卫兵”所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所谓阶级路线。“血统论”这个帽子或者标签，是陈伯达这个讲话里提出来的。

领袖要求把矛头对准当权派，而在群众里有两种力量是当权派的保卫者或者防火墙。第一种是受到当权派信任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他们是因政治的关系靠近领导人，与当权派关系比较密切。第二种是与领导干部有血缘关系的干部子女，而干部子女是老红卫兵的骨干。与保守派和老红卫兵对立的是造反派。造反派最初是少数派，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在中央的支持下发展成多数。北京和很多城市发生了造反派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往后，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11月10日，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赴京告状受阻，遂于上海西北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截14次列车，使京沪线中断20小时，震动全国，惊动中央。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在安亭签字承认“工总司”合法，随之引起工人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的高潮。上海市委在文革初曾经积极配合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但是后来运动进一步发展，上海市委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特别在是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陷入被动。

与造反派兴起的同时，地方和基层党委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在这样的情势下，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概括地说，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把群众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内，“矛头向上”批判领导干部的错误路线。所谓错误路线就是压制群众的路线，而这个路线是由上级贯彻下来的，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就从基层追到省市，直到中央制定路线的刘少奇。

在这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中，此前受到压制打击，在政治上或社会上处于边缘状态的群众被动员参加运动，形成了造反派。所谓处于政治边缘状态指被工作组打击、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的一些人，以及不受领导信任的人。社会边缘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政治是可以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涉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出身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出身中间状态的，一类是出身不好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学生中

是少数，而出身中间的占很大比重，尤其是在那些对运动有重要影响的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学。这样的学校集中了两类子弟，一类是干部子弟，但是干部子弟的人数通常不及出身中间状态的学生。后者指那些在旧社会的中间或中下阶级的子弟，出身不算好也不算坏。例如：职员出身包括：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等现在称作“白领”人员的子女。这些人在中学的造反派里比较多，也比较活跃。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伸直了腰板，追随领袖参与造反，充当马前卒。

经过三次发动，毛泽东终于唤起了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心甘情愿紧跟领袖造反的群体。与此相对应，党政领导当权派在这个阶段普遍受到非难、指责，不得不检讨自己，狼狈不堪。

2，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1967年的1月夺权至1968年的夏季）

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时期。

这个段时间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件。一个是“二月抗争”（当时被称作“二月逆流”）：一些副总理和元帅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上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其背景是毛泽东批评了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副总理和元帅们就此谴责中央文革小组，表达了领导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造反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是在中央，在地方则是“二月镇反”。武汉等一些地方的军队认定一些造反派是反革命，予以关押。一些造反派怀疑当地党委干部把记录了造反派言论的“黑材料”转移到军队，冲击军事机关，招致镇压。内蒙古、新疆都出现了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最严重的是青海西宁发生军队向造反派开枪，打死打伤三百多人的恶性事件。究其原因，造反派挟中央支持出击党政领导乃至军事机关；军队领导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厌恶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政治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对抗党的领导。

领袖认为“二月逆流”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于是发动群众反击“二月逆流”。本来在一月夺权之后，毛泽东说了一些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话，有约束造反群众之意，引发高层的抗争之后，转而反击。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造反派非但没有受到约束反而膨胀起来。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而后从4月开始，人民日报等官方报刊发表多篇重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不久，又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群众组织的小报则掀起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潮。批判刘少奇是中央引导的运动大方向。

1967年1月至4月。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北京5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当地驻军代表“三结合”组成。各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各地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斗争的焦点是夺权。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支左部队大多也卷入派斗。大部分地方的派性斗争是造反派内部在夺权之后新产生的分裂和冲突，少数地方是围绕原省委形成的保守派与造反派斗争的继续，也有二者兼有或者转化的情况。

群众派性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中央对一些地区的运动严重失控。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百万雄师部分群众和部分军人在东湖宾馆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当时，毛泽东正住在同一宾馆的另一座楼里，事件发生后仓促离开武汉。事件震惊了北京和全国。

武汉 7 2 0 事件以后，全国很快又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情况升级。如此下去，动乱会继续加剧，严重干扰批判刘少奇这个最重要的任务。

3，整顿和结束群众运动，重建秩序（1967年7月武汉事件至1969年4月中九大）

武汉事件之前，毛泽东已经启动新的“战略部署”，谋求重建秩序。武汉事件打乱了原有计划，加剧了动荡。事过不久，毛泽东决定扭转局面，重返既有的新部署。为此，下令制止群众冲击军队，维护军队的权威，并于8月底逮捕了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随后于1968年1月又逮捕了戚本禹。

此时，毛泽东要求大联合、三结合、整党、清理阶级队伍，意在重新建立秩序。所谓“大联合”就是要求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在学校按照班级，在工厂按照车间班组实行联合，原来的群众组织遂解体于无形之中。所谓“三结合”就是要求地方和基层逐步成立“军队、干部、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为新的政权。整党是要整顿和恢复此前瘫痪的基层党组织及其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是清理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批判、斗争造反派群众中的各种“坏人”，以使群众服从新的权威和秩序。再就是深入所谓对刘少奇路线的大批判。

上述活动均指向管控和抑制群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这两个运动不是对着当权派，而是矛头向下指向群众，是部分或基本针对造反派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是主张批判周恩来的学生组织，为数很少，大约30来人。由清查这个五一六兵团发展而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越搞越大，借此将很多造反派的头头和活跃分子打下去。1970年，北京大学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均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审查，无一幸免。

1968年春季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校园里出现较严重的武斗，屡禁不止。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带领工人到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并且常驻下来，领导学校的运动。至此，工军宣队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学生红卫兵运动结束，群众造反运动也很快退出政治舞台。

到1968年10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台湾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就通过党中央全会，在程序上正式认可打倒刘少奇。

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毕业生大部分下乡，少数到工矿；大学生毕业后先是到工厂农村部队基层锻炼大约一年，然后安排工作。

1969年4月，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进行认定，文革的主体阶段就此结束。

4，文化大革命的后继阶段

文革后续阶段的冲突是在扫尾阶段衍生或派生的矛盾和斗争，超出发动时期的谋划与部署。在这个阶段，党内斗争先是针对林彪，引起林彪外逃坠机蒙古国；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敲打周恩来；接着批判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

后续阶段的政治态势主要是党内上层斗争，没有文化大革命标志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造反运动。林彪问题是一次高层政治，没有群众的参与。林彪死后的政治也主要是党内高层斗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了群众，但是基本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方式，中央发动，各级各地党委跟进，类似于文革之前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路径。

（1）“斗批改”

“斗批改”是后续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端于主体阶段的后期。“斗批改”这个词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十六条所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另一个是专指十六条讲的改革（即“三改”）：改革教育文艺等上层建筑，例如：高校的招生、学制、教学内容的改革；文艺界推广8个“样板戏”；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医疗界把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安排大城市医生到农村基层长期工作；在农村大力推广赤脚医生制度等。还有进一步推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这个时期出现了外交的转变，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关系。在文革的主体阶段是要打倒帝修反，到了这个时期转为与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拉上了关系。如果人们问：文化大革命的对外政策到底是要打倒帝修反，还是联美反苏？不区别文革主体阶段和后续阶段就不容易说得清楚。

后续阶段还有“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这个运动是为重建新政权扫除障碍，为新政权立威。一批勇于独立思考的先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激烈批判“血统论”的青年个人遇罗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杀害的。“一打三反”在全国共抓捕了二十八万多人，枪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这个时期大规模的动乱已经停止，经济在坎坷中有所恢复和发展。

（2）林彪事件

这个时候出现了在毛泽东政治谋略之外的事情，就是1970年9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冲突，毛泽东支持了江青和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部署削弱林彪势力，其态势接下来就是要换接班人了。斗争致使林彪出逃，这里有很多的内幕，至今难以说清楚。

林彪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批判林彪给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个批判极左的机会。毛泽东却担心批判极左会危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故提出要批极右实质，叫停了纠左的进程。

林彪事件在党内外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领袖的神圣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质疑。

（3）维护还是纠正文革

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围绕着维护文革的实践和理论展开斗争。一方是毛泽东及其支持的江青等文革派，另一方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

这一阶段毛泽东谈话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毛泽东讲述的这些理论观点是片段和零散的，他已经到了晚年，对很多观点没有加以论证。后来邓小平的整顿涉及到纠正文革的一些政

策，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结果事与愿违，更多群众拥护邓小平而反感江青等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自发表达了深深的哀悼与忧虑。4月5日清明节前后，南京、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群众自发地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江青等文革派和文革的不满，天安门广场上有的悼念诗词以秦始皇暗喻当政者，北京有百万以上的民众卷入。史称此自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为“四五运动”。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邓小平被指责是幕后推手，被撤销了职务。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足一个月，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抓捕。此后中央宣布至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一斗、二批、三改”

（1）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从文化界开始，但是它的重点不在文化界，按照1966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所说，文革的目标是：一斗、二批、三改。

所谓“一斗”是要斗争和打倒所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重点，为此，要将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冲击一大批领导干部，揪出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为此，采取了发动群众参加党内斗争的方式。

所谓“二批”是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此，要批判一大批知识分子。

“三改”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没有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批判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党内当权派？矛头主要指向党外还是党内？矛头向上，还是向下？这在文革最初的四五个月里都是模糊的。

8月，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文化界，即所谓：一斗、二批。

但是手握权力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和他们影响下的保守派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们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界的革命，是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的运动。1957年，正是他们推动、领导或参与了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阻力来自这些人。

如上所述，毛泽东经过三次发动才把运动的矛头引向斗争党内走资派和刘少奇等领导人。第三次发动之后，党内当权派普遍受冲击，受伤害，不论后来是否被定为走资派。

（2）文革中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和主要目标并不一致

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是三部分人：党政领导干部、高中级知识分子、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在文革中，地位改变最悬殊的是被批判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人，从运动的领导者变为运动整肃的对象。以往的运动是当权派指挥整群众，文革变为群众蜂拥而起整当权派。

文革中遭遇最悲惨的是那些文革之前就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资本家等）。这些人是破四旧等运动中遭受残酷打击的主要群体，他们是具有原罪的群体，没有公民权，不受法律保护，是“群众专政”的对象。北京在破四旧运动中有1,700多人被打死，其中主要是这类人士。运动一来，谁都可以无所顾忌打击他们以显示革命性。而对高级领导干部，造反群众还是有所忌惮的。知识分子包括文革最初就被打倒的教师、校领导、作家、文学家等文化界人士也深受伤害，但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受打击的程度在“阶级敌人”和当权派两者之间。

讲到迫害，也要注意：在文革的不同时期，运动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会出现翻转。例如：工作组领导运动期间曾经打击持不同意见或挑战其权威的学生，甚至把他们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动学生”。这些学生可以说是运动的受害者。几个月后，运动转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来受打击的学生获得平反，反过来批判那些曾经整过他们的工作组，工作组干部就由加害者转为受害者。这种翻来覆去的情况并不少见。

文革的特点是在十年的长时间里，最高领袖在每一个时段都注意依靠和团结90%的人，打击少数。在打击的具体目标转换之后，又调整阵容，依靠和团结与此前有所差别的90%的人群。十年过去，很多人都充当过被依靠或团结的对象，也在某一个阶段受到过委屈和打击。在后来否定文革的时候，常常见到人们诉说自己被迫害的遭遇，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能够正视事实，反省自己曾经加害于人的则很少，政治人物尤其回避。

（3）文化大革命的反精英特点

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类人是党政领导干部，可以说是红色的政治精英。被打击的第二类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旧中国和新中国都是知识精英。第三类所谓“阶级敌人”是旧社会的中上阶级，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工农大众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反而受到政治推崇。他们遇到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打击，而是由长期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生活困窘。工人多年不涨工资，文革后期只给部分工人调高一级工资。城市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大多数农民则常年贫困。

与此相关，文革之后，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多否定文革，而工农群众对文革的反感，常常没有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那般强烈，而工农大众占人口的比例远超过政治和文化精英。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收入显著提升，而很多工人，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工人提高不多，甚至下岗，相对贫困。社会不同人群的不同经历是目前对文革不同评价的基本根源。

（4）文革是反对官僚压迫的社会革命吗？

在造反运动最激烈的文革主体阶段，领袖及中央反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没有提出要打倒“官僚主义阶级”。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1965年初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的用语，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很快，正式的提法定格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在文革期间经由大字报和群众出版物予以披露，但是中央的指示、两报一刊等权威传媒在很长时间内非常谨慎地避免提及“官僚主义者阶级”，避免把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活动解释成为批斗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后者很容易造成否定整个领导干部群体的印象。中央要求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还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还有犯过错误可以改正的干部。可见，中央没有把领导干部整体或部分正式当作“官僚主义者阶级”，没有笼统地提反对官僚压迫的任务。

直到1975年毛泽东风烛残年的时候，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念，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很多概念是很不清晰的，他自己也没有做认真的阐释。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事实说明：领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核心是党内斗争，而不是反对官僚压迫。部分群众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反对官僚压迫的意向，但只是潜流，一旦冒头就被镇压。例如：1968年撰文把文革解释成为人民反对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革命，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湖南长沙中学生杨曦光被关进监牢。

从分析群众参与造反的社会根源的时候，可以看到反抗官僚、当权派压迫的因素，但这不是领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宗旨。

（5）走资派果真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客观事实，还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政治帽子？学理和事实的分析都很难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过经典的论述。按照马列的论述，文革中所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基本名不副实。例如：农村的“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政策被批判为搞资本主义，但是事实上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一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灵活政策，说是搞资本主义，言过其实。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毛泽东给党内政策分歧中的不同政策主张扣上的一项帽子。

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会想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引进外国资本，引进香港和台湾的资本，又放开了中国民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现在，中国的私人经济，已经占有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改革开放给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人经济让出了半边天，并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事情，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事情论证1966年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实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突破苏联模式，引进资本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或许是邓小平在江西工厂劳动的时候，在那个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每天来回踱步子的时候逐渐形成的观念。当然，这只是猜想。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已经是党内外、上下层的大势所趋。

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实行大民主。

所谓“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对应，是在文革主体阶段实行的一种特殊动员方式，就是由最高领袖在原有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党委领导体系之外，从基层发动群众，运用“大民主”，普遍揭发和批判领导干部，以求发现和打倒其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文革“大民主”的实践是：最高领袖赋予群众不经党政领导审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乃至串连的权利，还应当包括昙花一现的票选本单位运动领导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以及群众组织参与协商产生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权利。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和大民主的运用都是阶段性的政策，而非长久的制度。这种自下而上实行“大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毋庸讳言，文革之前普通群众（公民个人或集体）实际上并不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无权向公众表达与官方不同的意见，不能自行张贴批评性的大字报，不能出版报刊和图书，不能游行集会，更不用说结社了。所有以群众名义出现的言论和活动均由党政领导掌控，除了赞扬和拥护之外，即使发表批评言论也是经过领导点头的。

大民主的内容主要是言论的权利。其核心是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都是言论权利，即让群众讲话，允许群众发表赞扬或批评的意见，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在毛泽东时代，“民主”的含义包括、并且常常主要指言论权利，尤其是发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权利。

文革中的大民主是定向的，也就是说，必遵照领袖制定的方向，只能在领导指导下进行批判。群众的大字报、报纸刊物、集会和组织均不得偏离领袖指引的方向，群众性的大批判必须遵循领袖的意图，而不能畅所欲言。同时，剥夺被批判者辩驳的权利。这不是通常意义的言论自由，只能说是最高领袖发动和操控群众的超常规手段。最高领袖以暂时赋予群众言论、结社、集会权利为手段，利用官民矛盾，发动群众，以打倒政敌。

这种大民主完全不受法制的约束，而是领袖的人治，是对法治的践踏。红卫兵得到领袖的支持，就可以抄家、打人而不受法律追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1968年夏秋，当领袖要求结束运动的时候，大民主就被收回，群众组织停止活动，报刊停办，自发群众集会销声敛迹，没有二话可说。

1975年宪法总纲增加了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字，实际上只是为了彰显领袖的意志，只是写在纸上，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相应专门法律保障，甚至没有准备付诸实施的迹象。矛盾的现象是：1975年宪法通过之时以及之后，群众实际上没有贴大字报提批评意见的权利保障；而在1966—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主体阶段，当时的宪法没有写这个“四大”，领袖说要搞大民主，群众就有了这样的权利。可见，宪法上写与不写“四大”的条文，其实践意义差别不大，关键是领袖或党的意志，宪法本身长期不被最高政治权威看重。

就言论和其他公民权利而言，文革以前党政领导人主导一切，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现象司空见惯，而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徒具空名，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重大弊病。与此对应，文革期间政治权力高度掌握集中到最高领袖手里，并授权群众实行大民主，大民主遂成整人工具，同样是重大弊病。文革大民主实践的结果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

文革大民主的方式不好，那么是不是应当回到文革前压制群众独立思考，不准随便讲话的状况？事实上，除了文革以前党政领导人主宰一切而群众监督被弱化到很低程度的情况与文革期间最高领袖带领群众整干部的大民主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中国人应当并且能够探索出切实保障宪法载明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需要争取的一个目标。

（2018年10月10日讲座，2019年1月15日修改）

〔本文由印红标根据2018年10月10日在网络文史讲堂的讲座整理而成，整理过程中略作删节和修改。听众预设是对文革历史知之不多或模糊不清的中青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档案探秘】

一份关于清华造反派记录在案的资料

• 孙怒涛 •

◇ 说明：

(一)

早在1981年5月到1982年9月的十二大期间，深谋远虑的陈云多次发表讲话，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的问题，要同本人核对，错误严重的要进行处理。正式拉开了清理“三种人”的序幕。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记录在案是清理“三种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动”和红二代则不在记录在案之列。记录在案由中组部青干局直接负责，全国各高校组织部门具体实施。到年底，各大学陆续上报记录在案的工作总结和统计资料。

据青干局干部崔武年在《我的83个月》一书中记述：这项工作从1982年开始，在全国四百六十所高等院校陆续展开，到1984年6月基本完成。初步确定“纪录在案”人员9567人（这里面包括校级学生造反组织头头4402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学生4865人），约占当时在校学生总数70.4万人的1.4%。……为下一步的整党工作和清理“三种人”——必须指出，“纪录在案”人员决不等于“三种人”——作了准备。

北京市委在关于清理“三种人”进展情况的一份报告中说“全市高等院校，共记录在案的八百五十一人，占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在校学生总数八万七千六百九十五人的百分之零点九七……根据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深入清理”大致延续到1986年。

(二)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份资料，就是清华上报到青干局对清华造反派进行记录在案的资料。资料的正文是打印件，资料名称的后面用手写注明是“未定稿”，资料的附件也是手写的。资料是不是形成了正式文本？正式文本是什么样子？我们均不清楚。资料没有注明日期。从内容分析，估计是在1983年的下半年。

当我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感到很震惊，因为此前没听说过更没见过类似的资料。

要是这只是存于清华的内部资料，也不会引起我的太大注意。但它是存放在中组部的，那就十分值得关注的了。

通览这份资料，就我比较了解的部分而言，我认为内容大多数属实，但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内容中掺杂着不少虚假不实的东西，还有诸如“煽动反军乱军”、“撰写反动文章”等罪名都是错误的。

2、带有明显的派性，对团派严，对4 1 4宽。即，如以对团派的尺度对待4 1 4，4 1 4中可能还有几个人也应该记录在案。反之，如以对4 1 4的尺度对待团派，团派中有好几个人是可以不记录在案的。

虽然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记录在案的问题要同本人核对。但在实际执行中，不仅未同本人核对，甚至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记录在案了几十年，因此无法指正其中的错误。记录在案对不少被涉人员的出国、入党、提干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份差错颇多的资料只能起点参考的作用，其内容不宜作为可靠证据引用。

（三）

2014年，当我接触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就认定有关方面编制这份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构陷、打压平民造反派。为此，我约请张比、孙耘、唐少杰三位校友对这份资料进行研究，组织了一篇《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收录在《历史拒绝遗忘》文集中（见P1311—1355）。

本来，这份资料的两个附件（表格）也打算以附录形式收录在文集里，公开发表。表格中总部委员和杀人凶手的姓名都打算实名公开，因为他们在清华文革中已是公众人物，没必要保密。其他人员的姓名都匿名了，因为没有必要公开，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文集的绝大多数顾问都赞同这样处理。

就在2015年元旦前夕文集即将付印之时，表格被扩散了，引起个别涉表人员的反弹。为避免凝聚了数百清华人心血的文集因这一突发事件而夭折，我不得不将表格撤下。这样，文集才得以在2015年2月顺利出版。

（四）

但是，我还是想找机会公开这份资料。

为什么我一定要公开这份资料呢？就因为这是有关方面构陷、打压平民造反派的有力证据。

在文革前期，老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都有罪错。文革后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陈云认为老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而平民造反派“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为了让不会掘自家坟墓的红二代接班，必须把最有竞争力的平民造反派头头、骨干打下去。于是，给他们戴上“记录在案”的紧箍咒成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团四两派的58位头头、骨干被定为记录在案。其中有2位即便“未发现问题”，也逃不了记录在案的命运，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当了一年多的平民造反派头头。而拉倒二校门、毒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策划制造8·24打砸抢事件的贺鹏飞们则不在名单中，他们正在步步高升！

有人说，既然表格中有些信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还要公开发表呢？含有不真实的信息当然是表格的一大缺陷，但这不正好说明我们指责他们“构陷”平民造反派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们吗？

为了避免某些副作用，突出公开发表这份资料的主要目的，我把所有涉表人员的姓名都匿名了。

#### （五）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的时候，我看到了校友阎淮写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

阎淮曾供职于中组部青干局。正巧，他当年就是负责对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的。（下面的楷体字引自《进出中组部》P222—235）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档”《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简称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由青干局负责。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

三天会议中，就贯彻“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以上是档原文）——进行认真学习领会。

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

清华记录在案原始资料如下：蒯大富的团派50人，其中有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者17人，反军乱军问题严重者13人，武斗骨干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团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余11人皆因武斗杀人。四一四派

8人，其中核心成员6人，反军乱军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记录的48人都有“主要问题”，唯独陈楚三和孙怒涛，只注明“四一四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由阎淮回忆录披露的清华记录在案的数据与我手中的这份资料完全一致，有力证明了我这份资料虽然是未定稿却是高度可信的。

阎淮对他曾经负责过的记录在案进行了反思：我认为：三种人只要不牵涉刑事犯罪，就不应该重新处理；记录在案人员更不必长期纠缠。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但是，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我有愧于他们！尤其我的学长孙怒涛和陈楚三，经过十几年反复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还要“记录”！全国类似情况不在少数，我更有愧对他们！

阎淮的道歉是真诚的，反思也是深刻的。就记录在案这件事，阎淮只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政策是由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等人制定的。

近几年我与阎淮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他有较深的了解，尤其是拜读了他的回忆录之后，我对他在八九年与体制决然分手从容出走的勇气和胆略深表敬佩！

#### ◇ 资料

名称：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未定稿）。

资料由正文（共20页）和附件（共22大张）两大部分组成。

正文有六个小节：

- 一、“文革”初期（1966年6月9日—8月4日）
- 二、红卫兵组织的产生（1966年8月8日—12月18日）
- 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成立及其分化演变（1966年12月19日—1967年5月29日）
- 四、两大派组织的主要问题
- 五、两派的组织机构及主要人员情况
- 六、对两派组织的清理情况

附件有四个：

- 附件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
- 附件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
- 附件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
- 附件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

下面是正文的第六小节和附件：

#### 六、对两派组织的清理情况



一九七〇年底开始的清查“516”运动，曾对两派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作过一次清理，将一部分有问题的人调回学校审查。审查结果：×××、×××、×××等三人定为敌我矛盾，不戴帽子，以观后效；×××、×××、××等三人定为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十二人定为严重政治错误，余者为一般政治错误或排除。一九七四年复查“批、清”运动时，把全部“严重政治错误”改为“一般错误”，材料全部销毁，实际上是一风吹。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些大的是非仍被颠倒，除6个杀人凶手逮捕归案依法判刑外，不少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和打砸抢分子没有受到审查和追究。

一九七四～七五年，原团保卫部头头之一×××、工总司头头之一×××作为坏分子逮捕判刑。

一九七八年四月，×××、×××以及长期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等四人逮捕归案，已依法判刑。

从一九八三年一月，按照中发〔1982〕55号文件精神，对两派组织在“文革”期间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处理。初步确定除上述已判刑的12人外，记录在案的58人。清理情况简述如下：

（一）对“井冈山兵团”的清理：

1、有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等14人记录在案，有的拟建议其现所在单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搞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等17人记录在案，情节严重者拟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严重者×××、×××等13人记录在案，少数情节严重者，拟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4、武斗的策划者、指挥及武斗队骨干造成严重后果者×××、×××等6人记录在案。

以上共计50人记录在案。

（二）对“414总部”的清理：

“414总部”核心成员记录在案的有：×××、×××、×××、××、×××、×××等6人。

此外，×××、×××2人是参加外地反军活动造成一定后果者记录在案。

“414总部”列为记录在案者共计8人。

根据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精神，我们正在对“文革”期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清理。

▲ 附件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略）

▲ 附件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

组织机构名称 | 姓名 | 性别 | 原所在系和班级 | 在该组织中的地位、头衔及其主要问题 | 初步清理情况 | 现所在单位 | 备注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及总部委员

××× | 男 | 工化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大量犯罪活动。 | 已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 在押

××× | 男 | 工化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第 2 号头头。1、策划、组织、指挥反军乱军。2、百日武斗总指挥。3、“7·27”武力对抗工宣队。 | 曾作“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记录在案 | 湖北制药厂制剂分厂

××× | 男 | 工化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武斗副总指挥。1、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武斗。2、指使司机李正明开车压死对方武斗人员谢晋澄。3、武力对抗“7·27”进校的工宣队。 | 记录在案 | 河北沧州石油化工厂  
党员

××× | 女 | 冶金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1、策划、组织、指挥“罗、文、李、饶”冤案，迫害干部。2、参与武斗策划。“5·30”武斗由她负责运来汽油火烧东区浴室。 | 记录在案 | 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 | 党员

××× | 女 | 数力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1、参加所有总部会议，武斗中负责后勤。2、“7·27”由她下达蒯大富“武力对抗”命令。 | 记录在案 |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 | 党员

××× | 男 | 自动化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1、策划、组织百日武斗，是“文攻武卫指挥部”核心。2、下令武力封锁主楼广场，致使一名无辜学生被打死。3、“7·27”武力对抗工宣队，亲自刺伤两名工宣队员。4、负责非法制造武器。 | 已判有期徒刑 12 年 | 在押

××× | 男 | 水利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1、策划、组织“罗、文、李、饶”专案组，任副组长。2、参与武斗策划，负责非法制造武器。 | 记录在案 | 水电部第一工程局，任科长 | 党员（1974·9 入党）

××× | 男 | 冶金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成员。1、第三编辑组负责人。2、参与总部所有策划迫害干部、武斗的会议。 | 记录在案 | 长春第一汽车厂越野厂 | 党员

××× | 男 | 电机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兵团保卫部长。1、搞打砸抢，肆意抓人打人私设刑堂。2、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挑动武斗，非法制造武器。3、“7·27”武力对抗工宣队。4、到武汉反军，进驻“湖北日报”，写反军社论。 | 曾按“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记录在案 | 邯郸市电机厂

××× | 男 | 工化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对外作战部副部长。1、负责动态组，向外地派记者站、联络站。2、反军乱军，到沈阳冲军区，占领军区大楼 11 天。 | 记录在案 | 北京工业学院

××× | 男 | 冶金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1、武斗时任东区武斗指挥，肆意抓人打人搞打砸抢。2、“7·27”武力对抗工宣队。3、到湖南反军，在常德地区搞武斗。 | 记录在案 |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81 年派往美国作博士生。

××× | 男 | 土建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土建系分部头头。1、武斗队长兼西区武斗负责人，策划武斗。在攻占三号楼时把对立派学生姜文波抓来毒打，致使姜跳楼身亡。2、“7·27”武力对抗工宣队，带队袭击 9003 大楼。 | 记录在案 | 马鞍山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 | 男 | 工物系 70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工物系分部头头。  
1、武斗队长兼东区武斗负责人之一，参与策划各次武斗。2、“7·27”武力对抗工宣队，在礼堂区扔手榴弹使一名军代表重伤，数名工人轻伤。 | 记录在案 | 铁道科学研究院

×× | 男 | 数力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兵团宣传部负责人，数力系分部头头。1、66 年 11 月贴出《狗、羊、人》大字报，影射攻击周总理。2、负责“井冈山报”、“井冈山广播台”，宣扬“彻底砸烂”理论。 | 记录在案 | 浙江绍兴钢厂

××× | 女 | 精仪系 67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兵团办公室主任。1、参加团总部各种策划会议。2、曾两次去鞍山参与反军活动，加剧当地两派组织对立。 | 记录在案 | 吉林辽源市拖拉机厂

××× | 男 | 数力系 69 届毕业生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1、礼堂区武斗头头，参与“5·30”武斗策划会，是现场指挥。2、“7·27”武力对抗工宣队，参加袭击 9003 大楼的策划。3、曾去湖南搞联络站，反军乱军。 | 记录在案 | 黑龙江省技术物理研究所

△ “罗文李饶”专案组（“罗文李饶”专案组主要头头×××及副组长×××见总部核心组栏）

××× | 男 | 工物系 67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组长，主要组织者、执行者。文革初期贴大字报声明退出“刘修党”。 | 记录在案 | 一机部自动化研究所 | 党员

××× | 男 | 水利系 68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副组长，参加抓人审讯，策划逼害干部的各种活动。 | 记录在案 | 湖北省葛洲坝工程局

××× | 男 | 自控系 68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文学宓组”组长，经常参加核心会，审讯罗、文，用残酷刑罚毒打逼供，罚站九天九夜。 | 记录在案 | 江苏省淮阴市政府办公室 | 党员

××× | 男 | 水利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李康组”组长，主持组织对李康刑讯逼供，还参与对文学宓的审讯，并毒打文学宓。 | 记录在案 |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 | 男 | 工物系 69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刘承娴”组长，毒打刘，逼刘在 12:00 前交待，致使刘跳楼受伤。后又强迫刘提前出院，对刘的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 | 记录在案 | 高能物理研究所 | 现自费留学美国

××× | 男 | 工物系 68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饶慰慈组”组长，主持组织对饶刑讯逼供，将饶臀部打烂，形成残疾。 | 记录在案 | 兰州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 党员

××× | 男 | 水利系 67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保卫组的头头。专门打人，以打人取乐。1968 年 4 月 14 日对被关押的干部轮流毒打一遍。 | 记录在案 | 唐山地震死亡

××× | 男 | 工物系 68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保卫组的头头。专门打人，用酷刑毒打逼供，在 1968 年 4 月 14 日对被关押的干部轮流毒打一遍。 | 记录在案 | 青海第二人民医院（已出国）

××× | 男 | 电机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的主要打人凶手。他采用各种刑具拔牙、灌氨水逼害干部。 | 记录在案 | 河北省对外贸易局秦皇岛办事处

××× | 男 | 电机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主要打人凶手。刘承娴跳楼前，对刘进行残酷折磨，打耳光、连续摔打、烟头烧脸、脚踢腹部、用棍子捅……。对其他被关押的干部、群众也打过。 | 记录在案 | 承德地区平安堡炼铁厂

××× | 男 | 动农系 70 届毕业生 | “贾春旺组”主要成员。用皮带、皮管、木棒打屁股和腿。当贾全身是伤时，还逼贾做“下蹲动作”和“仰卧起坐”。是打手，他还打过罗征启、黄安妮等。 | 记录在案 | 兵器工业部兵器系统工程研究所

××× | 男 | 无线电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李康组”主要成员。多次毒打李康，还参与对文学宓和饶慰慈的刑讯，是打手。 | 记录在案 | 江苏望亭发电厂电子计算机组

××× | 女 | 工化系 67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搞逼供信的骨干。主审文学宓和贾春旺等，在审文过程中，用铝管、竹棍、扫帚打文的脸部，打肿左脸又用匕首去划破右脸。 | 记录在案 | 兵器工业部第 206 研究所，陕西省长安县 10# 信箱

××× | 男 | 土建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用方木打李康、贾春旺的腰，头撞墙，烟头烧脸。 | 记录在案 | 邢台轻工业局日化二厂

××× | 男 | 工物系 68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专用方木打人，多次毒打文学宓，打肝区，踢小腹，用椅子压脚指，致使文学宓尿血昏过去。 | 记录在案 | 成都 519 信箱

××× | 男 | 水利系 69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多次毒打文学宓，打肝区，踢小腹，用椅子压脚指，使文学宓尿血昏过去。 | 记录在案 | 水电部第一工程局第二工程处副处长 | 党员（1979 年 7 月入党）

××× | 男 | 工物系 70 届毕业生 | “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两次罚贾春旺举着凳子站七天七夜。用皮靴踢、踩，使贾有严重内伤。 | 记录在案 | 国营渤海造船厂

××（原名×××）|男|无线电系68届毕业生|“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68年3月底去抓逃出虎口的罗征启，误抓了罗的弟弟罗征敷。×等对其殴打，用棉丝堵嘴致使罗征敷窒息而死。×是主犯，曾被拘留。清华大学建议追究刑事处分，齐齐哈尔公安局对其免于处分。|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

×××（又名×××）|男|精仪系67届毕业生|“罗文李饶”专案组中打手。68年3月底与××一起抓了罗征敷，将其迫害窒息而死。×是重要凶手，曾被拘留。|正在查找中

#### △ 文攻武卫指挥部及武斗队（指挥部成员及主要头头见总部委员栏）

×××|男|无线电系70届毕业|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清华东区武斗队头头之一。  
1、非法到山西搞武器枪支弹药，加剧武斗。2、68年“7·27”袭击工宣队进驻的9003大楼，×任总指挥，造成两死一伤的严重后果。3、持枪到教授孟昭英家强行“借”钱。|记录在案|合肥市长江路安徽省广播事业管理局

×××|男|动农系69届毕业|团派西区武斗队头头之一，动农系团派分部头头。参加清华“4·23”、“5·30”大规模武斗策划会，并参加武斗，曾担任现场总指挥，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东区浴室楼被烧毁的严重后果。|记录在案|上海宝山月浦十九冶分指挥部

×××|男|电机系69届毕业|团派东区武斗指挥部副总指挥，电机系团派分部头头。  
1、伙同×××等非法绑架电机系党员教师顾廉楚、总支书记王遵华，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刑讯逼供。2、参加“4·23”武斗策划会，并第一个冲上去强占学生宿舍十一号楼，以后又多次参加武斗。3、到教授杨津基、唐统一、黄眉等人家强行“借”钱，由于杨津基不“借”，×等将杨抓起来，关押，直到“7·27”工宣队进校。|记录在案|宁夏自治区科委技术物理研究所

#### △ 全国联络站

×××|男|冶金系讲师|“井冈山兵团”对外联络站负责人，“红教联”第2号头头。  
1、67·4月×和××等人组成“南京记者站”，×任“政委”，在南京反军。2、67·6月×主动把各地联络站组织起来，叫“全国联络站”，由他负责。3、策划、冲击公安部十三局。4、泡制、散布“大翻个”理论。|原结论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80年撤销原结论，用纪实方式记下主要问题。|在汕头大学

×××|男|土建系研究生|“井冈山兵团”全国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参加“井冈山兵团”骨干战斗组“老实话”组，任组长。2、积极参与策划成立军事动态组，推荐人选，组织人与军事院校联系，收集材料。|正在清理中|湖北省医药管理局

××|男|水利系66届毕业生|1、由兵团总部派往南京，参加江苏省“1·26”夺权。2、支持造反派反对许世友并到大别山调查许世友材料，刺探并泄露军事秘密。3、参与策划抢枪支持南京两派武斗。|记录在案|水电部南京自动化设备厂

××|女|工化系66届毕业生|1、参加江苏省“1·26”夺权，担任筹委会委员。  
2、67年7月在南京召开万人大会反对许世友，支持造反派冲击南京军区。  
3、煽动南京两派武斗。|记录在案|北京化工学院二分院|党员

××× | 男 | 土建系 67 届毕业生 | 沈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支持辽大“八·三一”反对当地党、政、军机关。2、冲军区大楼，占领大楼十天之久。3、参与当地两派武斗，左右了当地“文革”形势。 | 记录在案 | 沈阳市辽宁省城市建设研究院

×× (又名×××) | 男 | 自控系 70 届毕业生 | 沈阳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支持辽大“八·三一”反对当地党、政、军机关。2、冲军区大楼，占领大楼十天。后又冲政治部大楼，要揪政治部主任，占领政治部大楼 12 天。 | 记录在案 | 陕西省渭南地区广播事业局

××× | 男 | 自控系 69 届毕业生 | 沈阳联络站骨干。1、67 年“7·20”事件后，在东北收集部队番号、部署、历史、首长名字等汇编成“沈军简况”01、03、05 号，严重泄密，散发后追回。2、67 年 10 月—69 年 6 月被拘留审查过。 | 记录在案 | 安徽宁国水泥厂建设指挥部

×× (又名×××) | 男 | 工物系 68 届毕业生 | 驻武汉联络站负责人之一。1、介入当地“文革”运动。2、百日武斗中，两次去武汉运武器回校，其中有半自动步枪 10 支，合子枪、机枪各一挺。 | 记录在案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 | 男 | 无线电系 68 届毕业生 | 常州联络站负责人。1、介入当地运动，支持常州“主力军”武装返常，从 67 年 9 月 11 日起开始持续七天，此次武斗造成 70 多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的严重后果。2、支持炸毁奔牛铁路桥，使京沪线中断 12 天。 | 记录在案 | 江苏常州电子工业公司

×× (原名×××) | 男 | 电机系 66 届毕业生 | 杭州联络站成员。因跟踪毛主席视察，被中央专案组拘留审查。 | 记录在案 | 昆明电机厂电大教师 | 因中办下达了复查结论文件，××属于认识问题，故撤销记录在案的决定。

×× (又名×××) | 男 | 水利系 69 届毕业生 | 福州联络站成员。1、多次去福州反军反韩先楚，执笔或参与起草十多篇反军文章，在小报上刊登散发，其中《韩先楚是什么家伙》被台利用，受到周总理批评。2、到长乐、清流专区搞武器。 | 记录在案 | 湖北江陵县江汉石油学院政治部

×× (又名×××) | 男 | 工物系 68 届毕业生 | 福州联络站成员。1、参加反军、反韩先楚，编写《再问一百个为什么？》，为反韩造舆论。2、67·9 带队抄福州军区参谋长周世忠家，又到法院院长家“借”手枪一支。3、冒充军区名义到福州东郊粮库收了一个班解放军的三支步枪。 | 记录在案 |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机械化施工公司

#### △ 军事动态组

××× | 男 | 工化系 69 届毕业 | 团派军事动态组组长。1、67 年 4—5 月间，到各地去串联游说煽动反军，在校内设接待站与军内造反派串联。2、67 年 6 月 29 日，积极参与策划和参加抄徐向前住所及办公室的活动，抄来的部分机密材料拒不交出，扣留达三个月之久。并翻印散发《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 | 记录在案 | 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 (曾用名××) | 男 | 土建系 67 届毕业 | 团派军事动态组副组长。1、67 年 4—5 月间，到各地串联，煽动反军乱军。2、参加抄徐向前住所及办公室的活动，抄来的部分

机密材料拒不交出达三个月之久。3、68年3—8月，参加对罗征启、文学宓等同志的刑讯逼供。68年5月31日上午，×伙同打人凶手×××残酷毒打刘承娴同志，采用“扫塘脚”、踢肚子等法西斯手段毒打折磨，致使刘于当天下午跳楼重伤，而后死亡。|记录在案|常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住宅设计室

×××|男|土建系研究生毕业|团派骨干战斗队之一“老实话”战斗组成员，军事动态组骨干成员。1、插手军内“文革”运动，67年4月外出串联，收集军队情况，煽动反军。2、在南京支持军内造反派，反对许世友及南京军区。3、67年7月29日，参加抄徐向前家，翻印散发《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等。|记录在案|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所（据说已去美国留学）

×××|男|土建系研究生毕业|团派骨干战斗队之一，“老实话”战斗组副组长，军事动态组骨干。1、67年1—7月，同军内造反派串联，搜集军队材料，煽动反军乱军。2、67年7月26日，在清华大礼堂形势分析大会上发表演说，题为《陈再道的后台是徐向前》，煽动反对、打倒徐向前同志。3、67年7月29日晚，参加抄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活动，并摘抄徐向前的日记本，将一部分材料登在67年8月3日的《井冈山》小报上。|记录在案|长春市1009信箱（半导体研究所）|党员

△ 保卫部（保卫部总头头×××见总部委员栏）

×××|男|电机系66届毕业}团派“捉鬼队”头头之一，团总部委员，团保卫部头头之一。参加百日大武斗，68年6月到徐州非法搞武器，68年6月14日被徐州市革委会拘留。|清查“516”运动时定为严重政治错误，现予以记录在案。|北京油泵油咀厂

××|男|电机系70届毕业|团派“捉鬼队”头头之一。1、策划指挥67年1月6日“骗揪王光美”的活动，受到周总理批评后，1月20日贴大字报《严正声明》，攻击总理“发泄了刘少奇不敢发泄的恨”。2、积极参加百日大武斗。|记录在案|河北衡水地区电焊机厂技术科。

×××|男|电机系68届毕业|团派“捉鬼队”头头。1、策划、指挥67年1月6日“骗揪王光美”的活动。2、积极参加“百日大武斗”。3、68年3月，伙同×××策划、绑架了电机系党员教师顾廉楚，对顾进行长期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直到“7·27”工宣队进校。|记录在案|黑龙江省电子产品例行试验站。已于1983·10病故。

×××|男|精密仪器系68届毕业生|团派保卫部打砸抢抄抓的骨干之一。68年3月底，×伙同××等人去抓捕逃出的罗征启同志，误抓了其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厂工人），×等对其殴打，用棉丝堵咀等，罗被迫害窒息而死。×是凶手之一|当时未处理，现记录在案|贵州省计量局计量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员

×××|男|清华膳食科工人|团派保卫部值勤组的骨干，曾任组长。1、参加百日大武斗，在“5·30”武斗中用汽油烧东区浴室楼，参与火烧科学馆大楼。2、“文革”中大搞打、砸、抢。3、68年4月冲北京市公安局劳教所。|72年定为严重政治错误。81年因旷工11个月予以除名处分。

×××|男|清华修缮科工人|团派保卫部值勤组组长，骨干。1、“文革”期间拿长矛参加武斗，参加火烧科学馆大楼的活动。2、大搞打、砸、抢，曾抢了学校供应科劳保用品仓

库等。3、殴打驱赶工宣队。4、68年4月冲北京市公安局劳教所|清查“516”时定为严重政治错误。79年复查结论：维持原结论不变。|仍在本校修建队当工人。

××|男|原建工系钳工|团派保卫部值勤组骨干，曾任组长。1、“文革”期间大搞打砸抢抄抓，积极参加百日大武斗。2、结伙盗窃校医院保险柜，内有人民币1300元。3、结伙盗撬水利系党总支办公室、政工组文件柜，盗走内部资料两本。在机械系偷盗时行凶打伤值班人员。4、阴谋策划纵火烧清华园未能得逞。|1976年11月以盗窃、行凶、纵火罪判无期徒刑。|在押

#### △ 杀人凶手

×××|男|电机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用穿甲弹打死动农系实验室技术员杨述立。“7·27”工宣队进校时，用手榴弹炸死供电局工人潘志宏。|1973年5月判无期徒刑。|在押

××|男|动农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用半自动步枪无故打死土建系学生朱育生。1973年5月判有期徒刑12年

×××|男|自控系学生|团派“前哨”广播台台长，武斗队员。无故活活打死无线电系学生孙华栋。|1973年5月判刑15年

×××|男|精仪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用枪瞄准无故打死自控系女学生钱平华。|1973年5月判刑20年

×××|男|机械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打死工宣队员、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打伤光华木材厂工人邓广志、刘孝林。|1973年5月判刑15年

×××|男|冶金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用长矛刺死工宣队员、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忠现。|1973年5月判刑15年

××|男|机械系学生|团派武斗队员。开枪射击无故打死机械系学生杨志军。|1973年5月判刑10年

×××|男|原水利系司机|工总司骨干。武斗时开卡车压死学生谢晋澄。|1980年3月判徒刑2年|已开除公职

#### △ 宣传部（宣传部头头××见总部委员栏×××见杀人凶手栏）

×××|男|64年毕业留校教师|团派“井冈山”广播台台长，笔杆子。其问题正在清理之中。|正在清理|水利系讲师

×××|男|数力系70届毕业|团派《井冈山》小报编辑。1、67年连续写三论《清华党组织必须重建》的文章；2、75—76年，组织并亲撰写十论《走资派还在走》反动文章。|已开除党籍|现在清华基建修缮处工作

#### △ 工总司



××× | 男 | 清华校医院护士 | 团派工总司主要头头，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1、“文革”期间砸机关、抢档案、亲自撬了校党委办公室文书档案柜。2、迫害殴打干部，大搞刑讯逼供。3、积极策划武斗，组织武斗队，制造武器，武力对抗工宣队，殴打工宣队员等。| 1972年11月结论为：“不戴坏分子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行政记大过处分。”78年4月逮捕，经审查认为何的问题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于1980年5月释放回校安置工作。| 现仍在校医院当护士

××× | 男 | 原清华膳食科工人 | 团派工总司头头之一。1、“文革”期间搞打砸抢。2、积极参加武斗，曾是清华静斋区武斗副司令。| 粉碎“四人帮”后混入党内。后发现“文革”期间的问题，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已退休

××× | 男 | 清华汽车队司机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工总司头头之一。1、积极参加武斗，造成严重后果。2、“7·27”武力对抗工宣队，殴打工宣队员。| 71年7月清查“516”时自杀。

××× | 男 | 电子系工人 | 团派武斗队骨干，“红缨战团”头头，工总司骨干分子。1、指挥武斗，造成一人死亡、二人受伤的严重后果。2、搞打砸抢，敲诈勒索。3、武力对抗工宣队。4、盗窃国家财产。| 72年清查“516”时，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76年因盗窃判刑5年。

#### △ 斗蒋兵团

××× | 男 | 61届毕业留校教师 |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蒯大富的革筹小组成员，斗蒋兵团的头头。1、诬陷迫害蒋南翔同志。2、外出串联鼓吹揪“军内一小撮”。3、参加团总部派驻新疆联络站活动，参与策划抄王恩茂同志的家。| 清查“516”时定严重政治错误。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撤销了原结论。现拟记录在案。| 清华大学机械系讲师

#### ▲ 附件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设置表（略）

#### ▲ 附件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组织机构主要人员情况表

#### △ “414总部”核心成员

××× | 男 | 数力系70届毕业 | “414总部”总负责人。武斗期间，曾策划“抬尸游行”、炸三万五千伏高压电线杆等活动。| 记录在案 | 电子工业部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研究所 | 党员

××× | 男 | 无线电系66届毕业 | “414总部”核心成员，保卫组负责人。带队参加地派策划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打砸抢活动，参加抬尸游行。| 记录在案 | 清华无线电系讲师

××× | 男 | 工物系66届毕业 | “414总部”核心成员，驻长春联络站负责人，“414总部”武斗总指挥。1、支持“长春公社”反军区，揪军区首长，参与“长春公社”组织的抢军械库的活动。2、武斗期间，曾派人到外地去搞武器。| 记录在案 | 沈阳第二轻工业局

×× | 男 | 冶金系70届毕业 | “414总部”核心成员，参与策划“抬尸游行”。| 记录在案 | 邯郸钢铁总厂第二炼钢厂 | 党员

××× | 男 | 数力系 66 届毕业 | “414 总部”核心成员，负责宣传。没发现什么问题。 | 记录在案 | 北京某炮兵研究所 | 党员

××× | 男 | 自控系 66 届毕业 | “414 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 记录在案 | 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 | 党员（1974.11.入党）

#### △ 联络站

××× | 男 | 水利系 70 届毕业 | 首都红代会驻福州联络站头头之一。1、参与策划并参加抄韩先楚的家。2、参与当地武斗，参与策划火烧福建交际处，围困华侨大厦等。 | 记录在案 |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 | 男 | 工物系 66 届毕业 | 首都红代会云南问题调查组组长。1、参与策划、指挥向云南省委、省人委夺权，后又参加了组织掌权小组的活动。2、散播反军舆论，参与抄军区首长家的活动。3、参与当地造反派抢枪、武斗等事件。 | 记录在案 | 江苏涟水县唐集公社中学。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

【往事非烟】

“文革”一夜抬尸经历

• 林一安 •

那是 1966 年 8 月的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确切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和第二两个劳改队正在该校东侧厕所一带劳改，有的拔草，有的扫地，有的掏大粪，一个个汗流浹背。这时，两个身穿军装、手攥宽皮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面前。我偷眼一瞥，这两个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光景，虽一脸稚气，但透着凶狠。其中一个我还认识，是初三四班学阿拉伯语的。他俩冲着我们吼道：“我们今天晚上要用两个人，给我们抬死尸去！”然后指着党总支书记程璧和副校长雷力说，“你，还有你！晚上跟我们去！听见没有？”我们大吃一惊：谁又遭难了？红卫兵见我们摸不着头脑，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地主婆刘桂兰给打死了！晚上让你们收尸去！”刘桂兰？难道就是幼儿园打扫卫生的阿姨刘桂兰？这人我不陌生：她原来是收拾外籍教师办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语教师，因为教学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师办公室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里，她很有礼貌，干活又勤快麻利，模样儿虽不算漂亮，但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给人好感。后来，不知为什么给调到幼儿园去了。她为人很倔，不会拍马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敢直言顶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成了地主婆给整死了？

我们正疑惑间，忽听得红卫兵又大喝一声：“程璧！雷力！你们俩听见没有？晚上抬尸去！工具房集合！”雷力人高马大，身板硬朗，胆子也大，不发怵；再看看程璧，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给剃了个阴阳头，衣服上尽是被泼洒的墨迹；而且，前几天，一条腿还给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尸，岂不是作弄她吗？我实在看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对红卫兵说：“你们别让程璧去了，我去！”红卫兵看看我，没说什么，倒痛快地答应了。

干完活，回到宿舍，我才听说，刘桂兰是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我还听说，红卫兵原本也不知道刘桂兰是什么“地主婆”，是医务室（就在幼儿园附近）一个与她有点个人恩怨的人给红卫兵吹的风。

在劳改队里，数我最小，别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刚三十。我仗着年轻，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领教领教“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吃罢晚饭，我看时候差不离了，便到总务处西边的工具房集合，只见雷力早在那里等候了。还是他有经验，带了一条旧床单，是用来裹死尸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现得真是“积极”，不但体力活从不含糊，就连他十来岁的女儿由别人唆使在他被红卫兵打破的脑袋上撒盐，他也毫无怨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那两个红卫兵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拿出钥匙，打开工具房的小门，勒令我们进去抬死尸。我们不敢怠慢，赶紧低了头，钻了进去。我们定睛一瞧，在朦胧中看到刘桂兰横卧在地，混身血污，光脚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散发出一阵阵特殊的腥臭，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飞快地撒开床单，从头到脚把尸体一裹，他抱头，我抬脚，按红卫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车里。

到了火葬场，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勒令我们抬尸下车。一下车，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见我们抬着尸体来了，工人师傅倒很和气，把我们领进一个大房间，让我们把尸体放到地板上。我们依命行事，以为苦差就此到头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带，听到红卫兵大喝一声：“起来！走！在房间里走一圈！”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耳边是红卫兵的咆哮：“老实点！不老实，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走完一圈，心想这回该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与愿违，该着我们倒霉。这时，只听得轰隆隆开来四五辆大卡车。卡车停处，跳下二十来个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他们和我们那两个一接头，我们就意识到没有我们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帮红卫兵里，跑过来三四个，也挥舞着皮带，冲着我们大喊：“你们两个牛鬼蛇神，给我们抬尸去！”说着，便驱赶我们俩朝大卡车跑去。到了那儿，只见有不少人在卡车上忙着搬麻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里面装的准是死尸！这时，我脑袋里飞快地一转：“四五辆卡车，就算一辆装十个麻袋吧，这一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啊，天哪！”正发愣间，红卫兵又吼了：“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当然不敢违命，便随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劲地搬抬这一个个十分沉重的麻袋，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整整八条人命！那一夜，加上刘桂兰，我们竟抬了九具死尸！

干完活，我们俩站在停尸房门口，听候处理。我们学校那两个红卫兵也回来了，见我们俩乖乖地站着，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皮带，说：“表现还不错，滚吧！”说罢，押我们上了吉普车，回校了，对我们的折磨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仅我们所见的那一小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这一拨吧，那该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没有人想过，这些毛头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个个变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了呢？

（林一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

□ 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3月24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